

【政党理论】

精英与政党:中东欧五国民主化 进程的比较分析

费海汀 朱江彬

【摘要】政党的寡头化是转型国家民主化进程阻滞与逆转的一个重要原因。政党的寡头化是指政党对特定的政治精英个人或集团的依附。寡头化的政党会赋予政治精英更强的动机以挑战既有的竞争规则与程序,从而破坏精英集团间的共识,使转型的轨道偏移。本文以中东欧五个国家为案例,对两种现有精英行为模型(“蝇王”模型与“山中之王”模型)进行验证分析。结果发现,匈牙利、波兰、捷克三国属于正面案例,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两种理论模型的描述,但需要降低对转型之初制度建设的强调,更加重视政党建设对转型进程的影响。而乌克兰与斯洛伐克两国则更接近于负面案例,乌克兰未能达到模型的良好预期,斯洛伐克则未出现模型的负面预期。二者之间的重要差别同样在于政党体制与政党建设,特别是政党寡头化程度的差异。本文认为,政党建设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仍被低估。能抵制和摆脱寡头化倾向、约束政治精英的政党,更容易遵守竞争规则,更能为转型过程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关键词】民主化;民主倒退;政治精英;政党;中东欧

【作者简介】费海汀,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朱江彬,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本科生(北京 100091)。

【原文出处】《北大政治学评论》(京),2021.第11辑.185~203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东欧地区的民主化进程始终是比较政治学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同,中东欧国家大都受到苏联政治传统的影响,因此其民主化进程所强调的不是从零开始的“建设”,而是既有政治体制的“完善”与“转型”。与制度建设不同,制度变革往往意味着对既有权力体系和利益平衡的打破与再分配。这就极易引发社会群体不满,社会秩序被破坏。^①但令人瞩目的是,在其中的一些国家,激烈、深刻的政治变革没有引发大规模的冲突,且大体上在社会成本可控的范围内完成了制度改造。这些国家也因此被誉为民主转型的典范。此后,大量学者致力于对其经验进行分析和总结。其典型代表包括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与乌克兰。

但是在21世纪初,上述许多国家的民主化进程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阻滞与逆转。^②其中一个突出

的现象就是政党的寡头化,即本应秉持贯彻代议制原则的政党严重依附于特定的政治精英个人或集团;本应培养、选拔、推举政治精英作为代言人的政党不仅无法以组织和规则约束精英,反而会因精英个人的政治利益而被反复解散与重组。这种现象也常被描述为民粹主义的泛滥,即原本作为民主体制重要支柱的多党竞争完全沦为具有超凡魅力的政治精英个人及其恩庇集团的斗争。因此,本文尝试以波、匈、捷、斯、乌为具体案例,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解答:第一,民主解固或民主倒退与政党的寡头化现象之间是否存在关系;第二,政党的寡头化现象通常在何种情况下会发生,为什么会发生;第三,转型国家的政党是否存在解决寡头化问题的案例。

一、理论综述

(一)两种精英行为模型:“蝇王”与“山中之王”

“民主倒退”(democratic backsliding)是指一套给

定的民主制度的削弱(weakening)或瓦解(disassembling)^③,意味着任何政权内与民主治理相关的品质的恶化。^④目前对于民主倒退的解释包括能动理论、政治文化、政治制度、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与政治结盟、国际因素等理论。^⑤具体而言,对后苏联地区国家权威主义兴起的解释既包括以“坏非正式性”^⑥和“庇护政治”遗产^⑦、执政党实力、与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⑧等为解释因素的结构性的解释,也包括基于行动者的能动性解释。前者似乎更适用于解释连续性而不是变化,后者则被认为过度聚焦领导人的个人特征。^⑨我国国内学者也介绍或提出了类似概念,如“民主解固”^⑩“民主崩溃”^⑪等。在褚向磊和苏毓淞的研究中,代际差异、民粹主义政党崛起、民主治理水平下降等因素被用于解释“民主解固”;而在包刚升的研究中,选民分裂和政治制度是“民主崩溃”的关键因素。

本文认为,制度变革与制度建设存在根本性的差异。民主体制建构后,并不能立刻完成利益的再分配,也很难使相关各方立即接受新的权力分配方案。转型意味着采用一种新的权力结构设计,但这一设计并不能等同于权力的赋予和落实。换言之,在转型过程中,权力可能新的制度框架内依附于旧的规则运转。这同时也意味着,在旧有体制中保有巨大政治或经济资本的精英,可能新的体制中同样占据先发优势。因此在特定情况下,精英及其附属集团的行为和选择往往是影响转型进程的关键因素。

目前在关于中东欧地区政治转型的理论中,有两种关于精英行为的模型值得引起重视。

第一,“蝇王”(Lord of the Flies)模型。该模型基于卢坎·威对各国转型过程的描述与比较,可视为多国转型经验研究的综合与总结。模型提出者类比威廉·戈尔丁的《蝇王》,将民主转型比喻为四个阶段:(1)建立选举民主的尝试失败;(2)最具影响力的行动者之间分享非正式权力(寡头政

治)失败;(3)权力竞争的胜者夺权,将其对手排除在共同体之外,重新建立“致胜联盟”(winning coalition);(4)权威主义兴起。权威主义是政治精英权力最大化驱动的自然结果,因其政治意图缺乏强有力的约束。简而言之,“蝇王”模型的主要特征是由实力最强的行为者单方面夺取权力,最终形成竞争各方的零和博弈。不过,“蝇王”模型也可能会增加政治失衡的风险。若精英阶层中未出现能单方面夺取权力者,那么此种分散的行动者格局可能会阻止权力垄断,精英阶层被迫在国内使用大规模动员工具或在国际上呼吁外国行动者支持,并最终成为选举民主国家——不是因为精英和大众的自觉选择,而是因为主导地位的寻求者无法夺取和垄断权力。^⑫“蝇王”模型的逻辑如图1所示。

第二,“山中之王”(King of the Mountain)模型。该模型基于赫尔曼的经典理论“半均衡改革”,并将该理论原本分析的经济转轨延伸至政治转型领域。该模型主要包括四个要点:(1)旧体制中的领导人首要寻求收入最大化,用于提供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及其再分配,以购买忠诚和获得支持。领导人主要依赖于在不改善制度的情况下实现收入最大化,即依赖于提取经济租金。(2)政治租金(政治垄断)是经济租金的先决条件,后者源于对资源的控制,并通过恩庇—侍从网络和资源转移的各种非正式机制进行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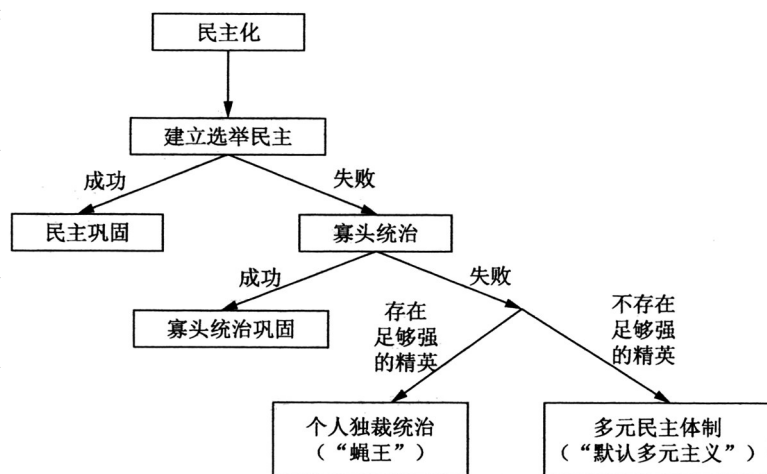


图1 “蝇王”模型

配。一般而言,即使是较低的租金提取水平,也需要一定程度的制度质量,但在一些国家,虽然其制度质量极低,但其租金水平极高。(3)“山中之王”没有可信动机提高制度质量或改变现状。后苏联权威主义制度中政治和经济租金提取具有相互制约性,租金是制度发展的障碍。政治和经济租金提取的垄断反过来导致一种基于恩庇—侍从渠道和私人物品交换,以换取政治忠诚的个性化规则倾向。(4)非民主政权即使表现不佳,也可能表现出相当的持久性。“山中之王”的脆弱性来源众多,如租金资源基础枯竭,薄弱和腐败的制度,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诉求,资源价格下跌等。^⑬

(二)理论模型的比较分析

上述两种理论模型实际上都证明了,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政治转型才可能直接建立并巩固成熟的选举民主。“蝇王”模型强调,建立选举民主需要竞争各方的力量大致均衡,且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要求竞争各方都尊重既定规则,在共识的框架中采取行动,而不能尝试挑战或颠覆规则。否则,就算存在多个竞争者且力量大致均衡,也只能使转型导向寡头统治,即非正式的权力分享。而“山中之王”模型则强调转型基于体制内精英的强硬派、改革派与体制外精英的激进派、温和派之间的四方博弈。成功建立选举民主的可能途径实际上也只存在于一种情形下,即体制内的改革派和体制外的温和派同时占据优势,在除此之外的其他任何一种情况下,转型过程都可能陷入停滞甚至逆转。

不难发现,对于中东欧国家而言,在更多的情况下,转型过程中建立的往往只是一种有缺陷的民主,而非理想化的选举民主。在这样的体制中,竞争各方都只是进行了暂时的妥协,而非真正接受了新的制度和规则。其中最典型的体现就是竞争各方一旦占据优势,就会追求规则向自身的倾斜,而非共同维护一个公平的竞争规则。“蝇王”模型将这种状态直接称为寡头政治;“山中之王”模型则认为在这种“有缺陷的民主”体制中,政治发展不仅会陷入停滞与腐败,还存在更加恶化的可能。因此,对于转型研究而言,更为关键的并不仅是分析理想情况下民主如何能获得进一步的巩固,而是分析在“有缺陷的民主”政治环境中会出现哪些情况,以及这些情况中存在哪些影响因素。

“蝇王”模型认为,在“有缺陷的民主”体制中,存在三种可能的发展方向:(1)如果竞争各方政治精英集团中存在足够强的精英个体,且此精英个体不愿分享权力,那么寡头统治会走向失败,“有缺陷的民主”体制进入个人独裁统治轨道;(2)如果竞争各方政治精英集团中不存在足够强的精英个体,则寡头统治与非正式权力分享的方案可能成功,“有缺陷的民主”体制进入寡头统治巩固轨道;(3)如果竞争各方的精英集团中不存在足够强的精英个体,且寡头统治与权力分享方案无法达成共识,则竞争各方都无法取得优势,不得不接受多元民主的结果,“有缺陷的民主”进入“默认的多元主义”发展轨道。

“山中之王”模型则认为,在“有缺陷的民主”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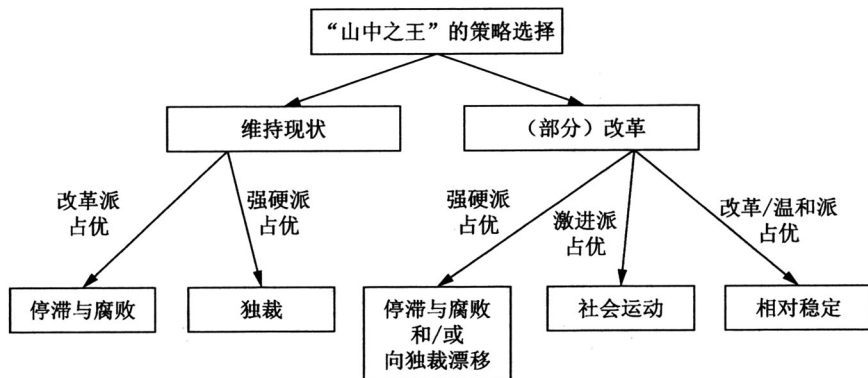


图2 “山中之王”模型

态下,存在三种进一步发展的可能:(1)体制内外各派精英选择维持现状或进行部分改革,但在此期间体制内强硬派占优,于是体制进入个人独裁发展轨道;(2)体制内外各派精英选择维持现状,但此时改革派占优,或进行了一定的改革,但改革过程中却是强硬派占优,于是因为无法摆脱体制痼疾而进入停滞与腐败的发展轨道;(3)体制内外各派精英选择对体制进行部分改革,但此时体制外精英占据优势且激进派占优,于是进入社会动荡的发展轨道。

比较两种理论模型可以发现,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其一,二者都强调政治精英选择和行动对转型过程的深刻影响;其二,二者对“有缺陷的民主”体制下可能的发展方向的划分大致相似,都认为可能存在个人独裁的恶化、寡头并立的停滞两种可能。二者的分歧在于“蝇王”模式更加乐观,认为竞争各方在都无法取得优势时,会为了维持统治,担忧社会秩序被破坏,而接受多元民主的结果;“山中之王”模型则认为此时由于竞争各方改革幅度较小,因此“有缺陷的民主”状态不可能维持,转型会陷入激烈的社会冲突。而二者在第三种发展方向上的不同估计,主要源于各自对精英及其影响转型过程的认识存在差异。一方面,“蝇王”模型强调既有体制内精英行动对转型过程的影响,而“山中之王”模型则强调体制外反对派民众行动对转型过程的影响;另一方面,“蝇王”模型强调精英个体或寡头对转型过程的把控,“山中之王”模型则强调精英派系或精英集团对转型过程的影响。

实际上,两种理论模型虽然对精英行动的认识和侧重都不同,但却存在一个潜在的结合点,即政党。对于“蝇王”模型来说,即使存在足够强的政治精英,他在竞争中也不可能单纯凭借超凡魅力持续不断地赢得选举;即使是民粹主义领袖,也需要精英集团的接受与支持。而对于“山中之王”模型来说,精英集团本身也需要推举政治精英个体作为代表参与选举和竞争,精英个人赢取支持的能力本身就是精英集团重要的政治资本。实际上,在许多中东欧国家的转型过程中,政党的本质就是政治精英个人

与精英集团的结合。因此,二者对“有缺陷的民主”情境下精英策略与行动的分析,完全可以转化为对转型过程中政党发展的分析。前述“在‘有缺陷的民主’政治环境中会出现哪些情况,以及这些情况中存在哪些影响因素”这一研究问题,则可以转化为“在‘有缺陷的民主’条件下,什么因素会引发政党的何种行为”。换言之,即是探讨为什么在有的情况下,作为竞争各方的政党能接受多元主义民主,遵循竞争规则,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政党只会导向恶性竞争,从而引起发展停滞、社会动荡。

二、正面案例:波兰、匈牙利与捷克

(一)匈牙利:欧尔班与“青民盟”

在许多中东欧国家的案例中,原本规划的多党竞争格局逐渐被一个主要政党执政的情形所替代。主要政党在执政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尝试对关键国家机构进行控制,由此使自己在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在匈牙利,这一政党是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Fidesz,以下简称“青民盟”),该党在1998年、2002年、2010年、2014年、2018年都是匈牙利国民议会的第一大党。^⑩

“青民盟”领袖欧尔班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政治制度进行去民主化和非自由化的修改。首先,2012年,新的《匈牙利基本法》生效,该版《基本法》是根据青民盟的理想而制定的。该法的起草和通过因缺乏政治或专业辩论而受到严厉批评,与反对党和民间组织的协商也被青民盟忽视。新《基本法》通过明确制定符合个别偏好的规范,确立了基督教保守派政治共同体的愿景,同时也为政治集中奠定了基础。其次,曾经具有广泛管辖权,包括行政制衡、税务和预算事项裁决、合宪审查等在内的宪法法院,于2010年在青民盟领导人阿戴尔·亚诺什(Áder János)的推动下被迫收紧职能,而新《基本法》允许判决绕过宪法法院,从而导致有可能制定出被认为违宪的法律。法官的选择也发生变化,从每个议会政党的代表都可以选择一个被提名人,转变为由议会最大党选择被提名人。宪法法院的法官从11名增加到15名,为忠于青民盟的人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使最

高司法机构成为恩庇网络内的政党机构。再次,随着《基本法》的颁布,所有监察专员办公室(ombudsmen's office)都被取消,以一个专员取而代之,该专员由亲青民盟人士担任。最后,青民盟还对选举制度进行修改,以“补偿胜者”选举方法和蓄意混乱划分选区策略,使得青民盟在此后的选举中容易取得多数地位。此外,青民盟还打击国内的非政府组织,指责其与企图颠覆国家的“境外势力”有关,并对媒体施以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成立“媒体委员会”,促使媒体宣扬执政党的政府成就,整个媒体系统从而处于欧尔班的控制之下。^⑮

匈牙利的案例不完全符合“蝇王”模型描述。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匈牙利在转型之初确实建立了相对比较稳定和成熟的选举民主,也因此长期被誉为中东欧转型的成功案例。但“欧尔班现象”的出现,实际上意味着转型从“民主巩固”轨道开始向“寡头统治”轨道偏移。而这种“民主倒退”的现象则是理论模型中未加描述的。不过,如果将匈牙利最初的转型认定为一种“有缺陷的民主”,那么则可以发现理论模型依然适用。匈牙利的发展轨迹可以大致描述为:建立了“有缺陷的民主”(选举民主建设未能完全成功),因此导向“寡头统治”,同时存在足够强的精英个体,因此寡头统治巩固,并向个人统治发展。同样,如果单纯观察转型之初体制内外精英的谈判,那么匈牙利的转型轨迹也不符合“山中之王”理论模型描述。转型之初,由于匈共党内改革派的开放态度与反对派组织的相对克制,匈牙利能够以圆桌谈判的方式完成转型。因此应该将匈牙利的转型路线判定为“相对稳定”类型。但如果继续观察民主化进程中的匈牙利政治进程,即将转型后的体制内外精英行动加以分析,则可以发现它仍然符合“山中之王”理论模型。以这种方式,可将匈牙利的发展轨迹大致描述为:维持现状或部分改革,且体制内精英(执政党青民盟)作为“山中之王”力量占优,因此转型过程整体开始向停滞腐败与个人统治方向发展。

(二)波兰:卡钦斯基兄弟和法律与公正党

在波兰,占主导地位的则是法律与公正党(PiS,

Law and Justice)。该党曾在2005年与另外两党联合执政,并在2007-2015年间成为瑟姆(Sejm)中实力强劲的反党派,其瑟姆席位约占总数的1/3。之后该党在2015年、2019年选举中都成为瑟姆的第一大党(作为“联合右派”联盟的一部分),也是波兰参议院的第一大党。^⑯政党的国家化已经成为由法律与公正党领导的波兰的长期特征。^⑰

对国家具有足够控制力的精英,往往会形成了一个寡头统治圈。例如在法律与公正党的主要领导人卡钦斯基兄弟周围,存在着一个内部圈子。在2010年空难之前,莱赫·卡钦斯基(Lech Kaczyński)和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Jarosław Kaczyński)两人大权共握,形成了一个“小圈子里的小圈子”,他们相信1989年的圆桌会议使波兰走上和平而不是暴力的过渡道路是错误的,因此波兰所经历的是一场尚未完成的革命。这一群体似乎还认为,现在需要一场永久性的革命来消除这种破坏。^⑱这一群体随着法律与公正党的掌权,对国家政策产生实质影响,其影响便是与煽动性政党的联合以及对左派的排挤。

相比于欧尔班领导下的青民盟,法律与公正党无力推动宪法修改,因此其为实现自身意志而采取了绕开法治框架的策略。法律与公正党也瞄准了波兰的宪法保障机构,即宪法法庭(Constitutional Tribunal),公然违抗宪法规定,拒绝承认前政府任命的三名法官,并选出三名准法官接替他们的职位。法律与公正党领导的政府甚至拒绝公布宪法法庭的裁决生效的决定,极大地侵犯了宪法法庭的权威,而理由仅仅是这些判决违反了由众议院批准的一项具体法规。这事实上将普通法规的地位凌驾于宪法之上,破坏了宪法的最高法地位。法律与公正党还通过新法律改变宪法法院的职能,并要求法官之间需要以更高的多数做出有效的决定,并以更多的法官人数按时间顺序决定宪法申诉。为进一步破坏司法系统,法律与公正党又推动立法提高法律程序的效率,其实质目的在于使司法系统受执政党的进一步控制,其成果是三部分别关于全国司法委员会、最高法院和普通法院的组织法律。此外,法律与公正党

还在议会和政府中采取各种手段排挤反对党。^⑩

与匈牙利相似,波兰同样也是中东欧国家中政治转型的典型代表,因此如果简单比照两种理论模型,同样也不完全符合。但如果与匈牙利一样,将其视为一种“有缺陷的民主”或“未能巩固的民主”,那么波兰的转型轨迹同样可以用两种理论模型来解释。根据“蝇王”模型,可以将近年波兰的政治发展轨迹描述为:建立了“有缺陷的民主”(选举民主建设未能完全成功),因此导向“寡头统治”,同时存在足够强的精英个体,因此寡头统治巩固,并向个人统治发展。比照“山中之王”模型,波兰与匈牙利一样,也是采取圆桌会议谈判的方式完成了转型初期的政治变革,并没有引起大规模的冲突。这理应符合此模型“相对稳定”发展路线的判断。但如果将卡钦斯基兄弟和法律与公正党判定为“体制内精英”,那么波兰近年来的政治发展轨迹就可以与匈牙利一样,被描述为维持现状或部分改革,且体制内精英(卡钦斯基兄弟)作为“山中之王”与其支持者的强硬派力量占优,因此转型过程整体开始向停滞腐败与个人统治方向发展,而不是最初判定的“部分改革—改革/温和派占优—相对稳定”发展路线。

(三)捷克:巴比什与“是的2011”

“是的2011”(ANO 2011)是捷克目前的执政党,该组织于2011年由该国富豪安德烈·巴比什(Andrej Babiš)发起,并于2012年政党化,翌年于捷克立法选举中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后于2017年选举中跻身议会第一大党,巴比什出任捷克总理至今。“是的2011”的崛起被认为是对捷克政党政治格局的一次重大冲击。此前,捷克政坛中政治光谱的不同位置上有四大政党稳居,从左、中左、中间、中右分别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共产党(KSCM)、捷克社会民主党(CSSD)、基督教民主党(KDU-CSL)和公民民主党(ODS)。2010年之后的趋势表明——2010年选举中,保守主义政党“传统责任繁荣”和民粹主义政党“公共事务”(VV)已经获得相当多的选票——此种建制已经无法回应社会的诉求,尤其是在反腐败、反建制、反低效的问题上,^⑪而这恰恰是“是的2011”

胜选策略的发力点。

安德烈·巴比什并不归于传统的左右划分,而是一位自称“技术官僚”的民粹主义者,将自己的政党与作为“阴谋集团”的传统政党划清界限。其基本政治主张是多数主义、中央集权、削弱权力制衡、提高行政效率等。^⑫巴比什领导着一个寡头集团,即爱格富(Agrofert)集团,它是捷克最大的贸易集团。巴比什的“是的2011”则被认为是巴比什个人权力的载体。^⑬

另一位不可忽略的捷克领导人是米洛什·泽曼(Miloš Zeman)。泽曼是捷克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于1998—2002年任捷克总理,并于2013年至今任捷克总统。根据捷克的政治体制,虽然是一个议会制国家,但捷克的总统也享有可观的权力,因为许多国家权力的行使需要总统和总理的共识与共担责任。^⑭而泽曼被认为是一位反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者,是巴比什的政治盟友,他们共同制定了捷克的反市民社会和精英统治议程。

相对于波兰与匈牙利,捷克的案例更能证明简单套用“山中之王”模型的问题所在,以及民主巩固的艰巨性与长期性。这一模型的缺陷在于严重高估了体制外政治精英的民主动机。在这一模型中,体制外精英被认定为民主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激进派与温和派之间只存在策略差异,而不存在立场分歧。但在体制内精英中,强硬派和改革派之间则存在立场分歧。这一模型的基本逻辑在于,改革派、激进派和温和派都是民主化进程的动力,只要能限制强硬派的力量和行动,民主化就会顺利进行。但上述三个案例,特别是捷克的案例反复证明,即使是原先支持民主化进程的激进派和温和派,当其成为执政者时,完全可能将自身的立场转变为抑制民主化进程的强硬派。这同时也能证明,转型完全不能简单等同于“选举民主的建立”此类具体事件,而应将其视为一个各方反复博弈直至局势趋于稳定,各方都最终接受并不试图挑战当前规则的长期过程。反观强调力量甚于立场的“蝇王”模型,其在捷克案例中的解释能力就要强于“山中之王”模型。在将巴比

什和泽曼视作强力政治精英的情况下,捷克的发展路径就在相当程度上符合“有缺陷的民主—寡头统治—存在足够强精英个体—寡头统治巩固并向个人统治发展”的描述。

三、负面案例:乌克兰与斯洛伐克

(一)乌克兰:从克拉夫丘克到库奇马

相比作为“默认多元主义”之典型的摩尔多瓦,乌克兰的内政演进则可以较好地为其自身内部的缺陷因素所解释:发育不成熟的执政党、软弱的威权主义国家以及乌克兰东西部的民族分裂。默认多元主义尤其典型地表现于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总统时期(1991—1994年)。在这一时期,国家几乎处于无运转状态,总统的控制能力微乎其微,缺乏有组织的支持基础和强大的地方支持网络,他在政治巨变中的核心作用及其立场的多变使其遭到苏联时期要职人员的疏远。立法机构中几乎不存在政党或类似政党的组织,议会混乱,而总统未能通过恩庇和惩罚手段成功地取得主导地位,这反而导致权力朝向议会转移,^③从而建立起一种“默认多元主义”。

列昂尼德·库奇马(Leonid Kuchma)总统时期(1994—2005年)乌克兰政治的主要特征则表现为权威主义倾向的反复波动。库奇马在1994—2000年一度建立起权威主义政体,他依赖其从苏联时期起维持的区域和经济网络统治着议会,实施比克拉夫丘克时期更大规模的镇压异见分子和选举舞弊。2000年“磁带危机”揭露了1999年总统大选库奇马胜出所依赖的腐败和滥用职权,使得库奇马险些被弹劾下台,其支持率遭到重挫。而一直以来库奇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精英叛逃,事实证明,之后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的竞选运动组成人员以及“橙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中的核心人物几乎都是库奇马政府的叛逃者。尽管如此,在2004年之前,库奇马仍然拥有巨大的优势:大量的赞助资源、俄罗斯的全力支持、乌克兰经济的高速增长。^⑤

尽管如此,2000年之后,反对派还是乘势而动并开始取得一些胜利,如罢免了作为总统盟友的议会

副议长,挫败了总统罢免基辅市市长的尝试,阻止了剥夺季莫申科(Yulia Tymoshenko)议会豁免权的企图等。政府与反对派的斗争集中爆发于2004年大选以及后续延续至2005年的“橙色革命”,其中,库奇马和政府派的总统候选人亚努科维奇、反对派领袖尤先科展开选战,亚努科维奇以较高的得票率战胜尤先科。然而,即便亚努科维奇胜券在握(虽然被指控选举舞弊),支持尤先科、反对亚努科维奇及其选举欺诈的抗议仍然不可逆转地爆发了。而亚努科维奇最终的失败,仍然需要归咎于执政党发育的不成熟和党内的三心二意。选战期间,库奇马并没有对亚努科维奇表示明显的赞助。库奇马自身仍有谋求其第三任期的打算,这可能会导致地区分裂加剧,国家整合失效。^⑥

与上述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案例相比,乌克兰案例与两个理论模型所描述的路线之间存在比较显著的差异。根据“蝇王”模型的描述,乌克兰本应属于比较典型的“建立选举民主失败—偏向寡头统治—寡头统治失败—不存在足够强的政治精英—走向默认多元主义”路线。克拉夫丘克时期乌克兰的民主转型显然不能视作成功,寡头库奇马统治时期过后,尤先科、亚努科维奇和季莫申科并立的情形也不能认定为存在足够强的精英个体。并且在库奇马之后的时代乌克兰不仅在国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建制社会动员,各派精英也各自寻求了外国行动者的支持。但与预期的“默认多元主义”方向不同,乌克兰的政局完全陷入了寡头之间的恶性竞争。乌克兰虽然建立了多党竞争等一系列民主制度,但其政党呈现出严重的寡头化现象。政党不仅无法约束精英的意志和行动,反而严重依赖于政治精英。寡头化的政党完全成为政治精英的选举工具,不仅完全没有政党意志或政党凝聚力可言,反而在选举失利时就会立即被解散重组,以便为政治精英争取更多的支持。相对而言,“山中之王”模型反而可能更贴近乌克兰的政治进程。如果克拉夫丘克与库奇马时期的乌克兰还可以视作“部分改革—(体制内)强硬派占优—停滞与腐败”的路线,那么之后各种反对派和

在野党的行动就可以视作“部分改革—(体制外)激进派占优—社会运动”的路线。遗憾的是,此模型没能进一步描述社会运动之后的潜在可能。显然,在乌克兰的案例中,后续的发展路线呈现出“社会运动—民粹主义—寡头与寡头化的政党恶性竞争”局面。

(二)斯洛伐克:从梅哈尔到祖林达

在斯洛伐克的案例中,主要政治精英为弗拉基米尔·梅哈尔(Vladimír Mečiar)。梅哈尔是一位强势领导人,1992年起,梅哈尔及其民主斯洛伐克运动(Movement for a Democratic Slovakia, HZDS)领导着斯洛伐克。1992—1998年是梅哈尔完全掌控政坛的时期,其间民主斯洛伐克运动强有力地把持着议会,在1992年选举中夺取了议会内一半的议席,在1994年选举中其议席数是第二大党的三倍以上。即使是在1998年该党遭遇大选滑铁卢以及梅哈尔下台时,它也仍然是议会第一大党。^②

1994年,梅哈尔联合斯洛伐克民族党(Slovak National Party, SNS)和斯洛伐克工人联盟(Union of the Workers of Slovakia, ZRS)组成联合政府。该执政联盟在执政期间,显示出“无限制的多数主义统治的趋势”^③。梅哈尔以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为意识形态,蔑视民主原则,通过任命和提拔忠于自身的法官控制司法机构,否决针对限制梅哈尔权力的立法倡议。针对反对者,梅哈尔及其政党通过立法和财政再分配限制反对派行动,并攻击反对派,称其涉嫌与匈牙利少数民族和境外势力的勾结。^④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斯洛伐克,梅哈尔也并不能完全做到大权在握。换言之,反对派当然不处于绝对优势或相对优势,但也不处于绝对劣势。首先,由于斯洛伐克的政治体制实行议会第一大党领袖任总理并组阁,执政的前提是其领导的政党或执政联盟占议会多数,这意味着梅哈尔仍然需要联合议会中一众反对派小党。其次,尽管总统米哈尔·科瓦奇(Michal Kováč)和宪法法院主席米兰·契奇(Milan Čič)在捷克斯洛伐克解体时曾是梅哈尔的合作者,但他们在1994—1998年间仍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和延缓了梅哈尔的权威主义倾向和进度。最后,由于斯洛伐克实施比例代表制,梅哈尔无法在议会获得3/5的

多数票以修改宪法,而如果失去其若干小同盟政党的支持,梅哈尔也无法将选举制度改革为多数制或混合制。^⑤

1998年,基督教民主运动(Christian Democratic Movement, KDH)、民主联盟(Democratic Union, DU)、民主党(DS)、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Slovakia, SDSS)和绿党(SZ)组成的斯洛伐克民主联盟(Slovak Democratic Coalition)向梅哈尔及其执政联盟发起挑战。尽管民主斯洛伐克运动最终仍为议会第一大党,但在极度孤立和微弱优势的情况下,该党承认失败并接受谈判。最终,斯洛伐克民主联盟领导人米库拉什·祖林达(Mikuláš Dzurinda)领导的执政联盟上台执政。在祖林达执政期间,新的宪法得以颁布,斯洛伐克确立了以议会民主、比例代表制、多党制、联合政府和合宪审查等为主要特征的政治体制,标志着斯洛伐克民主化进程进入新阶段。

此后,梅哈尔及其寡头统治逐渐走向衰落。2000年,梅哈尔被斯洛伐克警方逮捕,罪名是他任职期间的欺诈。在2002年的选举中,尽管民主斯洛伐克运动仍然获得20%的较高比例选票,然而,没有其他政党愿意与其合作。结果,祖林达领导斯洛伐克民主联盟组成新一届政府。尽管这也与民主斯洛伐克运动的内部分裂有关,但政党间对于以梅哈尔及其民主斯洛伐克运动为代表的反民主势力的反对的共识,有效地抵制了梅哈尔继续其寡头统治和独裁统治的企图。^⑥

相对于乌克兰,斯洛伐克是一个更值得研究的负面案例。乌克兰案例证明了“蝇王”模型中的“默认多元主义”局面没有出现,而斯洛伐克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蝇王”模型中的“寡头统治—存在足够强的精英个体—一个人统治和寡头统治”的局面没有出现,“山中之王”模型中的“部分改革—强硬派占优—停滞与腐败”的局面也没有出现。梅哈尔可被认为是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足够强的精英个体,并且也成功使支持自己的制胜联盟精英集团成为寡头化的政党。然而,尽管始终处于弱势地位,斯洛伐克的许多反对党也没有以寡头化或塑造并依赖魅力领袖的方式与已经寡头化的执政党竞争,最终在规则的范围

内促进了民主化进程的发展。更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乌克兰还是斯洛伐克,其转型之初的选举民主建设进程都十分坎坷,并不如波兰、匈牙利与捷克那么顺利。在长期和反复的博弈之下,乌克兰陷入了寡头之间的恶性竞争,但斯洛伐克却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更具秩序、更加良好的政治环境。虽然斯洛伐克当前的民主质量尚存争议,且其未来发展仍待观察,但能够在不利的局面下推动进步,并且摆脱路径依赖,促进政治向更良好的方向发展,这些特征都使斯洛伐克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案例。

四、结论

综上所述,两种理论模型在解释中东欧国家政治转型时都出现了偏差,且主要的偏差都集中在对转型进程的预估方面。这本身也是许多现有转型理论的主要缺陷,即强调转型之初制度建设对整体转型进程的影响程度。实际上,无论是选举民主的建立,还是权力结构的重建,都只是复杂艰难转型进程的第一步。新的制度设计并不一定能迅速且直接地转化为新的权力运转机制。许多国家的转型过程都体现为“新”制度环境下“旧”精英的竞争。因此,如果降低最初的乐观预期,将这些新的制度都视作“有缺陷的民主”,将转型视作体制内外精英的反复博弈,反而能使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与其将转型视作一个在关键节点进行选择的树形结构,不如将其视作一个反复循环的动态结构。其中,政党制度与政党建设是一个重要的变量。从上述五国的案例中不难发现,政党的寡头化是推动转型向权威主义方向偏移的重要因素之一。政党的寡头化不仅会催生并巩固依附于政治精英个体的恩庇网络,同时精英及其附属集团力量的不断增强也会赋予其更强的动机来挑战既定规则,以反建制或回避正式规则、制度、程序的方式使竞争环境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倾斜。

两种理论模型的另一个缺陷在于过高估计了社会运动和体制外的力量。“山中之王”模型忽略了即使是原先支持民主化进程的激进派和温和派,一旦成为执政者,完全可能将自身的立场转变为抑制民主化进程的强硬派。而即使是不太强调立场倾向的

“蝇王”模型,同样严重高估了社会动员对民主化的促进作用。例如经历多次广场抗议的乌克兰不仅没能成功推动民主化进程,反而催生了大量民粹主义领袖、政党与运动。此外,外国行动者支持的效用也被高估了:一方面,引入外部势力更多起到的是破坏性而非建设性作用;另一方面,一旦引入外部势力,所参与的就绝不可能仅仅是单纯支持民主化进程的力量,更多是抱有各自地缘政治考量的众多行动者。政治秩序的建立依然要靠政党,单纯靠引入体制外力量、社会运动和民粹主义是无法摆脱寡头统治困局的。政党本身就是一种对精英行为的约束,只有制度化的政党才能使政党竞争更容易向规则而非挑战规则的轨道靠近。换言之,有序转型才能最终带来秩序。

由此,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都在中东欧五国的案例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验证。首先,政党的寡头化的确是民主解固或民主倒退中的重要因素,民主化的阻滞和逆转常常是由于政党本身组织规则的退化与削弱。寡头化的政党可能赋予政治精英更强的动机以改变和颠覆竞争规则。其次,政党的寡头化可能出现于转型的任何一个阶段。寡头化对政党而言是一个极大的诱惑,特别是在民粹主义情绪高涨的环境下,一个挑战秩序和建制的领导人会很有号召力,且有着大量拥趸的领导人本身就是多党竞争环境下政党的一项重要资本。最后,政党在转型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政党的作用不仅体现于多党竞争规则的确立,更在于政党内部的制度建设。完善的组织程序、明确的政党纲领、严密的党规党纪,是政党抵制寡头化倾向的重要工具。一个能让政治精英“守规矩”的政党,更容易在多党竞争中遵守规则;而众多政党遵守规则,才更有可能建成一个有序发展的政治环境。

注释:

①参见项佐涛、李家懿:《中东欧转轨三问——30年历程的回顾与反思》,《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年第6期。

② Hanley, Seán & Vachudova, Milada, "Understanding the Illiberal Turn: Democratic Backsliding in the Czech Republic,

"East European Politics, Vol.34, No.3, 2018.

③ Nancy, Bermeo, "On Democratic Backsliding,"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27, No.1, 2016.

④⑤ Waldner, David & Lust, Ellen, "Unwelcome Change: Coming to Terms with Democratic Backsliding,"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27, 2018.

⑥ Ledeneva, Alena, *Can Russia Modernise? Sistema, Power Networks, and Informal Govern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⑦ Hale, Henry, *Patronal Politics: Eurasian Regime Dynamic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⑧ Levitsky, Steven & Way, Lucan,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⑨ Gel'man, Vladimir, "Bringing Actors Back in: Political Choices and Sources of Post-Soviet Regime Dynamics," *Post-Soviet Affairs*, Vol.34, No.5, 2018.

⑩ 褚向磊、苏毓淞:《民主解固——西方自由民主制的危机》,《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5期。

⑪ 包刚升:《民主崩溃的政治学》,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⑫ Gel'man, Vladimir, "Bringing Actors Back in: Political Choices and Sources of Post-Soviet Regime Dynamics," *Post-Soviet Affairs*, Vol.34, No.5, 2018.

⑬ Melville, Andrei & Mirnyuk, Mikhail, "Bad Enough Governance: State Capacity and Quality of Institutions in Post-Soviet Autocracies," *Post-Soviet Affairs*, Vol.32, No.2, 2016.

⑭ See <https://www.politico.eu/europe-poll-of-polls/hungary/>.

⑮ Bíró-Nagy, András, "Illiberal Democracy in Hungary: The Social Background and Practical Steps of Building an Illiberal State," *Colección Monografías Cidob*, Vol.24, 2017.

⑯ See <https://www.politico.eu/europe-poll-of-polls/poland/>.

⑰ Przybylski, Wojciech, "Explaining Eastern Europe: Can Poland's Backsliding Be Stopped?" *Connections*, Vol.29, No.3, 2018.

⑱ Gati, Charles, "Backsliding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onnections*, Vol.6, No.3, 2007.

⑲ Bevacqua, Davide, *Democratic Backslide in Poland: Domestic and EU Implications*, Thesis of Mast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Affairs,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Bologna, 2018–2019; Sata, Robert & Pawel, Ireneusz, "Caesarean Politics in Hungary and Poland," *East European Politics*, Vol.1, 2020.

⑳ Bruncík, Miloš & Kubát, Michal, "The Crisis of the Czech Politics 25 Years after the Velvet Revolution," *Politeja*, No.28, 2014.

㉑ Babiš, Andrej, "O čem sním, když náhodou spím," Prague, 2017, in Hanley, Seán & Vachudova, Milada, "Understanding the Illiberal Turn: Democratic Backsliding in the Czech Republic," *East European Politics*, Vol.34, No.3, 2018.

㉒ Čirhan, Tomáš & Kopecký, Petr, "Career Backgrounds, Professional Network and Party Cohesion: The Success of ANO in the Czech Republic," *Politologický Časopis—Czec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2, 2017.

㉓ "Constitution of the Czech Republic," see <https://public.psp.cz/en/docs/laws/constitution.html>.

㉔ Way, Lucan, *Pluralism by Default: Weak Autocrats and the Rise of Competitive Politic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59–65.

㉕ Way, Lucan, *Pluralism by Default: Weak Autocrats and the Rise of Competitive Politic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65–79.

㉖ Way, Lucan, *Pluralism by Default: Weak Autocrats and the Rise of Competitive Politic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65–79.

㉗ See <https://www.politico.eu/europe-poll-of-polls/slovakia/>.

㉘ Malova, Darina, "The Trouble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in Slovakia," *Politická misao: časopis za politologiju*, Vol.XXXVII, No.5, 2000.

㉙ Trantidis, Aris, "Building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Strategies for Autocratisation and Resistance in Belarus and Slovakia,"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3, No.1, 2021.

㉚ Szomolányi, Soňa, "Slovakia: From a Difficult Case of Transition to a Consolidated Central European Democracy," *Slovakia: From a Difficult Case of Transition*, Vol.1, 2004.

㉛ Szomolányi, Soňa, "Slovakia: From a Difficult Case of Transition to a Consolidated Central European Democracy," *Slovakia: From a Difficult Case of Transition*, Vol.1, 2004.